

中国战略传统丛书

门洪华◎主编

中国的战争行为

〔美〕弗兰克·基尔曼 费正清◎著

门洪华 刘笑阳 李晓寒 周璐铭◎译 门洪华◎校



人民出版社

中国战略传统丛书

门洪华◎主编

中国的战争行为

〔美〕弗兰克·基尔曼 费正清◎著

门洪华 刘笑阳 李晓寒 周璐铭◎译 门洪华◎校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孔 欢

版式设计:姚 雪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战争行为/[美]基尔曼,[美]费正清 著;门洪华等 译,门洪华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中国战略传统丛书/门洪华主编)

ISBN 978-7-01-015360-5

I. ①中… II. ①基…②费…③门…④门… III. ①战争史—研究—中国
IV. ①E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9749 号

中国的战争行为

ZHONGGUO DE ZHANZHENG XINGWEI

[美]弗兰克·基尔曼 费正清 著

门洪华 刘笑阳 李晓寒 周璐铭 译 门洪华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91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5360-5 定价:4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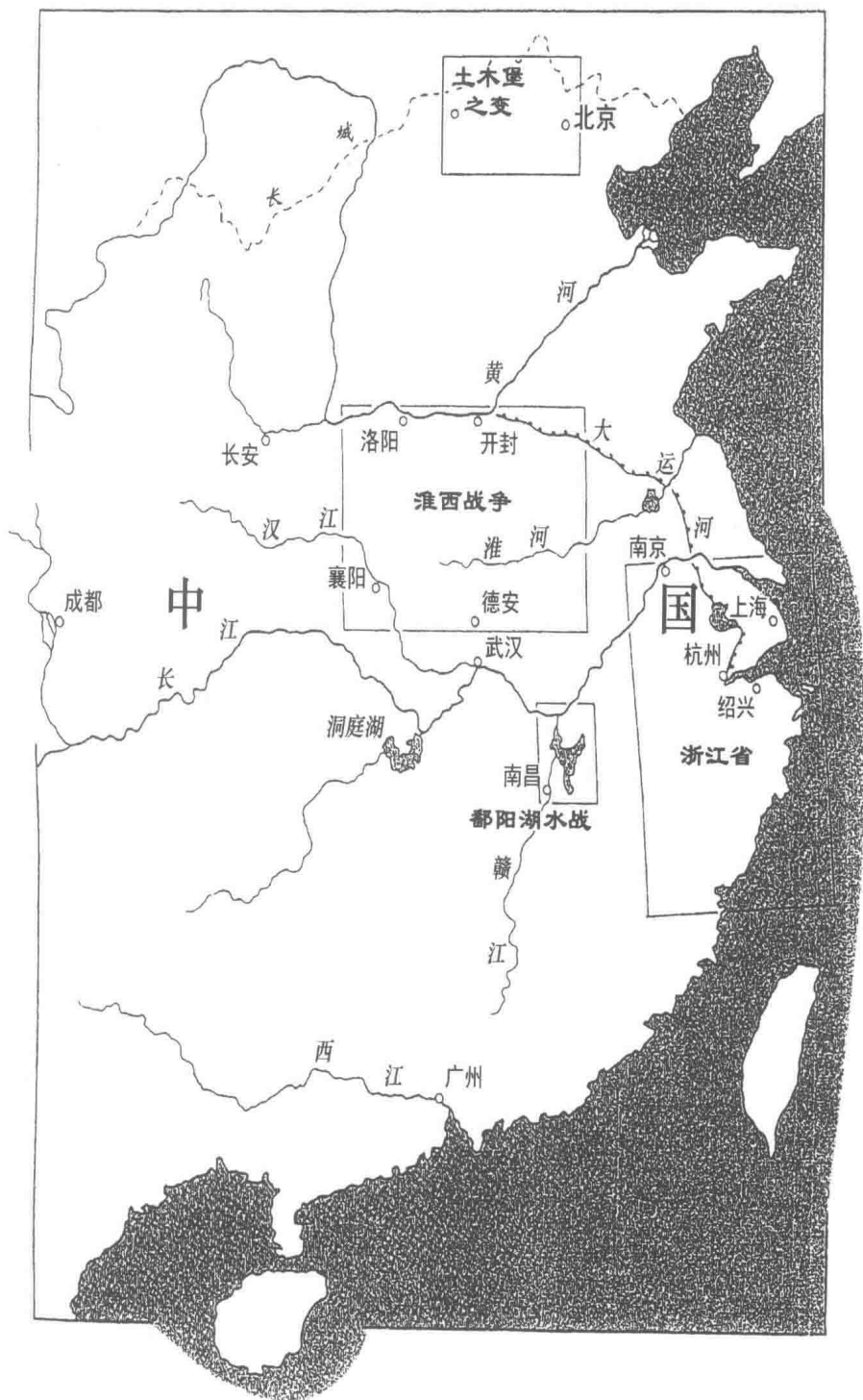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题 献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杨联升教授

致 谢

尽管世界各地的诸多学者倡导进行中国军事史研究,但至少 10 年之前相关研究是严重匮乏的。1963 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哈佛大学主办关于中国政府制度的开创性会议,邀请罗荣邦(Jung-pang Lo)教授宣读其关于中国军事史文献的论文。^①1965 年,贺凯(Charles O. Hucker)教授组织、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办关于明朝政府的研究会议,^②极力主张应立即举办关于军事史的研究会议。随后,阿瑟·怀特担任主席的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中华文明研究会邀请弗兰克·基尔曼着手主持组织该会议,并由贺凯先生和费正清先生协助。该会议于 1969 年 8 月 24—29 日在马萨诸塞州德纳姆市麻省理工学院的恩迪科特会议中心举行,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中华文明研究会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办。

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大家不仅讨论了本书所收录文章的初稿,还对其他学者的诸多书面发言和口头发言进行了热烈讨论,我们深深感谢如下学者的积极参与:密歇根大学张春树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明朝文献史项目房兆楹教授,法国前驻华大使馆武官、法国陆军准将雅克·桂乐玛(Jacques Guillerma),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公会大学詹姆斯·米林格教授(James Millinger),台湾陆军中将(前作战部长)蔡文治,美国陆军退役上校威廉姆·怀森(William Whitson),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教授和余英时教授。我们还要感谢莱纳特·弗兰泽尔(Lennart Frantzell)、理查德·詹森(Richard L. Johnston)、怀德·维克森(Wade Wilkison)为会议记录所做的工作。

我们共同感谢杨联升教授对会议讨论所做出的方方面面的贡献,并将本书题献给他。我们借此机会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和迈阿密大学的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L. Dreyer)的贡献,他们

① 罗荣邦(1912—1981 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系康有为外孙,著名中国海权史专家,著有《跨越西海的帝国:海上力量与明初海军》等。——译注。

② 贺凯(1919—1994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汉语言学家和历史学教授,著名中华帝国史专家,是推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译注。

未曾与会,却为我们提供了论文。作为本书的共同主编,我们相互感谢并向各位作者致意。

弗兰克·基尔曼 费正清

1973年3月

目 录

导言 中国丰富的战争经验 费正清 / 1

文武之道:军事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 3

中国官僚政治包含着多少尚武精神? / 8

亚洲内陆对中国军事史的影响 / 11

本书的个案研究 / 15

中国的战争行为 / 22

先秦时期的战争:阶段与形式 弗兰克·基尔曼 / 25

备战的范例 / 29

肉搏战:对战斗和士兵的指挥 / 39

战 后 / 42

城濮之战 / 44

井陉之战 / 52

结 论 / 58

汉武帝的征伐战争 米歇尔·罗意威 / 64

汉武帝征伐战争的总体进程 / 66

汉王朝的实力和局限 / 71

汉朝军事战略的要素 / 78

汉军的战场指挥 / 83

汉武帝征伐战争的结果 / 99

地方对中央的防御:淮西战争(815—817年) 查尔斯·A.皮特森 / 118

淮西:唐代中后期的自治藩镇 / 120

中央和地方的战争准备 / 125

战争的第一阶段(815—816年) / 131

战争的第二阶段(817年) / 138

对淮西防御性质的猜想 / 145

中世纪中国的攻城与守城 赫伯特·弗兰克 / 149

防御准备 / 151

武器和战术 / 158

十三、十四世纪的三场守城战 / 172

结 语 / 182

1363 年鄱阳湖之战:明朝建立之时的内陆水战 爱德华·L. 德雷尔 / 191

竞争的战略要素 / 192

周旋于对手之间的明军(1360—1362 年) / 194

汉军对南昌的包围(1363 年 6—7 月) / 196

浙江的反明叛乱(6—8 月) / 201

明向长江上游的远征(8 月 15—25 日) / 203

陈友谅解除对南昌的围困(8 月 28 日) / 207

鄱阳湖水战(8 月 30 日—9 月 2 日) / 210

水战的结束和陈友谅之死(9 月 2 日—10 月 3 日) / 218

1449 年土木之变 牟复礼 / 228

一、蒙古国的兴起 / 229

二、宦官专政与 1449 之役 / 233

三、土木之变始末经过 / 238

四、错失发展良机的蒙古 / 245

五、没有汲取教训的中国 / 249

1556 年胡宗宪大战徐海 贺 凯 / 257

一、军事问题的实质 / 258

二、胡宗宪:面临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 265

三、1556 年胡宗宪大战徐海 / 270

四、结论 / 284

译后记 / 287

导言 中国丰富的战争经验

◎ 费正清

中国对当今世界的众多贡献之一就是其与众不同的军事史,而迄今相关研究少之又少。本书研究涉及中国境内外会战、围攻和战役以及抵制外敌入侵和镇压叛乱,起自公元前 632 年,迄至公元 1556 年。本书研究者的目标是解析性的,意在展现中国军事风格和传统的方方面面。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战事频仍,当战争管控已经关乎人类存亡之际,本书的努力显得极其适时。国家和政治组织之间的激烈冲突正在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和一致的威胁。如果军事史有助于应对这一危机,我们当然必须考虑到中国进行乃至避免战事的经验。西方扩张时代似乎在越南战争达到了某种顶峰,西方扩张造成的后果比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战争模式代价远为高昂。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防御性军事动员的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一个有核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运用其新近获得的核能力进行自我防御,而避免自我毁灭,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难解之谜。在此问题上,我们需要参考方方面面的看法和观点。

正如十年前沃尔特·麦丽斯(Walter Millis)指出的,“继续从昔日的战争

史推断未来,不仅仅有可能引致文明尽毁,而是必然如此”。他认为,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队总参谋长亨利·哈勒克(Henry Halleck)将军、英国军事作家 G. 汉德森(G. F. R. Henderson)、英国军事史学家查尔斯·欧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富勒(J. F. C. Fuller)和其他该领域的人士相比,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历史性观点并不过时。他总结指出,军事史“不再专注研究昔日的战争,而是更少关注军事,更加关注民事……更多地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转向应用科学更精当的术语”^①。从各个方面讲,由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中国军事史有可能提供独具特色的智慧和启示。

对中国战争行为的研究,也有助于缓解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参与新的跨国秩序必须做出的调整。有鉴于此,理解中国的军事传统具有现实性的价值: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应对北京的承继者,也有助于我们摒弃糟粕、汲取精华。现在中国历史也是我们普遍性遗产的组成部分。

即使抛开这些现实价值,中国军事传统吸引我们的是,它如此卓然不同,比西方军事传统更为丰富。弩、铸铁、火药的发明者同样也发明了造纸、印刷术、科考和官僚制度。除上述煌煌成就之外,他们很早就确立了文高于武的思想,因此,在西方民间传说中,中国一直拥有和平主义的良好声誉。现代之前的其他民族未曾留下如此全面的军事制度和战绩的文献记录。在经历战国时代之后,中国于公元前 221 年实现武力统一,其后十数个中央王朝和同等数量的小朝廷的建立,均是运用军事手段的结果。中央权威来自沙场征战。统一的维系一则源自武备,二则源自军事史学家不能忽视的非军事因素。

本书分析了颇具代表性的、流传至今的中国军事经验:春秋时期仪式化的战争,战国时期仪式与战术的结合,大汉帝国的亚洲内陆问题,唐朝对国内地方割据势力的镇压和明代对沿海海盗的剿灭,围城的战术与政策,内陆水战,朝廷掌权者可能铸成的大错。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这些历史个案无疑

^① Walter Millis, *Military History* (Washington, D. C.: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61). 这一广为人知的文献并未关注亚洲,其他绝大部分军事史著作亦如此。例如可参见:Edward Mead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尽管它们均发生于独特的中国文化之中和中国社会里,某些方面却体现出普遍性的价值。

文武之道:军事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如果意识到中国必须克服某些内在的地势特征的话,我们就会对中国大一统的成就刮目相看。著名地理学家乔治·克鲁塞(George Cressey)游历颇广,他把中国的山脉比作“从青藏高原伸出的手指”。^①从这些手指之间流向东方的大江大河更增加了它们易裂变的影响。但是南北走向的山脉使得地形纵横交错,造就了可堪独立的平原和飞地。例如,四川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富裕的盆地,早在古代就有了农田灌溉;唯有通过诸多关隘才能从北部进入成都平原,要从东部进入成都平原,则只能经三峡沿江而上,唯一的方式是乘船拉纤,这是一块造就政治分离主义的天然飞地。同样,唯有通过华中地区的关山阻碍,才能进入福建和广东的河谷地带,而西南的云南和西北的陕西均属高原地带,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概言之,中国内部天然人口中心和经济实力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从空间范畴上看,中国胜于新巨人美国和苏联;从时间范畴上讲,中国甚至比欧洲还要古老,至少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仅仅依靠暴力,不可能将政治大一统强加于如此多样化、在历史和地理上如此分化的中国次大陆。骑马穿越华北平原及其向长江三角洲的延伸地带,丝毫不比横穿北欧平原容易,而后者哺育了截然不同的几个国家,而华北平原并非如此。简言之,维系中国的统一,需要的远比有效的后勤保障或军队更多。它需要政治、军事的应变才能和社会组织的创造能力,而同时还要有军事能力作为补充。

从地理角度来看,西方扩张起源于希腊、罗马对大海的利用,促成了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殖民地和帝国,这比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早了两千年,并延续至今,以同样的方式接管了世界。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防御主

^① George Babcock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4, p. 38.

义的渊源是,中国华北地处内陆,远离其他文明中心和海路联通,使之主要关注内部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对外扩张。古代的中国未曾出现过克里特岛制海权之争、特洛伊战争、雅典海军、腓尼基海上贸易。在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变得重要起来之前,统一的中华帝国足足历经了千年的增长和演变。其广远的影响是,另一个千年之后,19世纪中国向近邻东南亚的移民越来越多,他们乘坐欧洲的船只抵达欧洲殖民地,甚至部分拥有了欧洲的进取心。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特殊的海外扩张能力或许正在走进死胡同,而中国对国内社会组织特别关注的价值将会凸显出来。

文胜于武(文质彬彬胜过野蛮的武力)并不仅仅是垄断年代史编纂的文官强行灌输的虚构故事。相反,它是中国在建构社会秩序上的一大成就。如何在社会秩序中确保对军事的管控,是中国最早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由于军事技术进步刚刚触及这一问题。这是我们在勘察中国军事史领域时首先关注的一点。

从时期划分的角度看,我们将公元前221年之前战事频增的古代历史和其后帝国军事管控的记录区分开来。古代中国对秩序和统一的追求历史漫长,其间150个左右的家族所统治的邦国逐步合并为十数个大的诸侯国,其后通过混战减少一半,直至公元前221年实现了最后的统一。

在该500年期间,早期的两个半世纪被称为春秋时代,约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当时诉诸暴力显然为世人所厌恶;其后赢得战争胜利却是统治者的最终评价标准。^①然而,战争仅仅是当时邦国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历史文献记录了当时的惯例,这包括:邦国的建立、承认和消亡;使节、使团和人质的派出;领土的获得或丧失;罪犯的引渡;冲突的解决;度过饥荒的合作;通过不定期会议和协约达成会盟,有的意在限制战事。^②

但是,其后的两个世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却是长期痛苦的延续,这一时期被称为战国时代,当时的大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强大的军队,它们之间的战争更为密集、更有组织性、更加残酷。最近的一项研

① 参见本书中弗兰克·基尔曼的文章,英文版第27页。

② Iriye Keishiro, *Chugoku Koten to Kokusaiho*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Tokyo, Seibundo, 1966). 更早的研究可参见: Richard L. Walker, *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Hamden, Conn., Shoe String House, 1953.

究表明,春秋时期,“至少有 110 个以上的邦国”消亡或被吞并,只有 22 个邦国得以生存。^① 此后不久,这一数字就有了进一步的缩减。战国中期弩的发明以及公元前 4 世纪铁兵器的使用相互影响,^② 各国征募更庞大、军纪更为严明的军队,这些军队由职业军人指挥,使用信令以协调行动,更加关注胜利,而更少关注仪式。贵族战车基本上让路于步兵战术战略,许多军事著作研究步兵战术战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约公元前 400 年至公元前 320 年的《孙子兵法》,该书迄今仍对中国和世界军事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③ 其后不久,骑兵从北部“蛮族”引进来,跨骑所用的裤子也被一同引入,尽管当时没有引入马镫。

《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之作。它是古代军事谋略家的巅峰之作,总结了古人关于如何进行作战、使用何种手段、实现什么目标的智慧。与该书同时被奉为经典的同时代著作是《孟子》。《孙子兵法》强调动摇心志、打乱敌人的计划,这显然与早期儒家关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首要地位的看法不谋而合。战国时期,恰逢乱世,涌现了大批理想主义的经典著述,《孙子兵法》与其他经典一样,对后世帝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元前 221 年之后的两千年里文献丰富,如何进行分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秦始皇实现了最后的统一,终止了国内的战事频仍。大一统成为伟大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意味着国内和平,是繁荣和文明生活的前提条件。它还意味着大一统的思想,正统是国家必要的工具,因此汉初政治家转向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及其追随者。最终形成的理念混合体,即帝国孔教(Imperial Confucianism)显然会使孔子本人大吃一惊,因为它夹杂着法家等其他学派的某些概念,就像罗马教会(Church of Rome)建立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但同时吸纳了其他不同宗教和社会的概念一样。汉朝官僚秉持帝国正统思想,厌恶战争。他们赋予厌战思想以伦理基础,从而歪曲了

① 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 - 222 B.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59.

② 关于中国军事技术的全面研究,参见:Joseph Needham and othe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这是一套多卷本丛书,最新著作是第四卷:*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③ 参见《孙子兵法》如下英译本:Samuel B. Griffith, trans., *Sun Tzu: The Art of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该书附有对毛泽东战术思想的介绍。

中国思想正源。进一步的研究无疑会将汉朝实现的文官至上与宋朝新儒家学说支持的学者型官员拥有更为复杂的地位区别开来。

由规范所确定的中国理想社会是等级制的,无论国家还是家庭均如此。秩序的实质是,某些人拥有崇高地位,其他人自然处于低端。父亲和皇帝因其处于各自组织中的顶点,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妇女、青年及臣民相应发挥从属性的作用。“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儒家社会凝聚在一起,责成他们分别遵从统治者、父母、丈夫。

同样的等级制方式维系着来之不易的社会秩序。第一个也是最被推崇的方式是教育,即对经典教条的灌输,每个人都要充分理解“社会惯例原则”(即“礼”,如何行为),依照其应有的地位行事。如果这一方式失败了,第二层次的社会行为准则就是奖惩,这尤其适用于无法全面认识到如何规范自己行为的地位卑下者。在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层次上,统治者应该根据其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进行奖善惩恶。因此,根据律例,殴打父亲的儿子最终被斩首示众,而杀死不听话儿子的父亲却不会受到惩罚,除非他行为残忍,因为对父母的孝顺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①

在这一规范结构中,军事在第三层次发挥作用,当社会处于混乱不堪之时,经典教义的灌输和奖惩的劝导都不再有用,军事成为最后的手段。如果统治者确定了适当的道德基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发挥正当的作用,就没有必要对许多人采取暴力强制。

上述对人身强制的轻视深深根植于儒家教义。儒家经典将自我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赞为君子,君子能够不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因为,他乐观地相信,优雅而适当的举止对旁观者产生富有教益的吸引力,从而获得道德声望。正确的行为赋予其道德权威,这是一种权力。以正确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做正确的事不仅维护了有教养的关系网络,也确认了他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

对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皇帝而言尤其如此。因为皇帝诉诸武力,即承认自己不能像圣人一样运用治国之术,其行为失败了。诉诸武力意味着笃行文道的破产。其结果是,武力是最后的手段,需要时机的正当性,也需

^① 关于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工具的作用,参见: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

要纪事赋予其合法性。

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倾向就潜藏于此。战争难以得到颂扬,因为不发生战争才是理想。道德绝对站在和平一边。讴歌战争不会带来经济利益,邻居的富裕从未吸引中国海盗跨越边境或横渡大洋。正如克莱尔指出的,罗马进行的对外征服和战争是一个主导产业,而中国持之以恒地贬低战争的荣光。^① 将军们甚少成为典范,他们掉脑袋的机会不比他人少。中国年轻人不会出现像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拿破仑这样饱受赞美和模仿的人物。中国也不会像西方一样出现受万众敬仰的青年英雄。我们发现,中国最像罗宾汉的一个人物是三国时期(公元222—280年)的诸葛亮。在中国的帝国纪事中很难发现圣战,就像难以找到复仇的上帝或愤怒的耶和华一样。道德价值观并非源自站在一旁、等待重创异教徒的神祇。与旧约或伊斯兰的观点不同,中国的世界观甚少拟人化,也不那么好战。

从国内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战事的地位亦在下降,这些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皇帝处于一系列影响力辐射区的核心。如果他通过道德的行为进行有效统治,避免强制,那么他的权威来自处于核心地位的适当作为。鉴于他处于文明秩序的核心,他的典范带来的不仅是直接臣属的顺从,而且也会获得非中央王朝直属的外夷领导人的膜拜,尽管其影响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自然递减。^② 其结果是,他关注在中国内外可能出现的任何违背社会秩序的暴力性武装行为,这些都会被视为造反,损害正当的秩序。迄至1840年,英国试图改变广州公行贸易制度,武力发动鸦片战争,英国人被定位为“夷”,不是反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是反对以北京为中心的文明,在这一文明中,英国当然处于外围。

中国道家建构的规范性理想阻碍和约束了暴力的运用,这是否比山上布道更有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相比基督教而言,前者远为看重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人们认为和平对每一个人都有利,通过武力进行的暴政统治对谁都没有好处。鉴于正当行为的理想建构

① Here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 1: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② 关于朝贡体系的合理性,参见:Joh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在中国宇宙理念之中,这一理想的破灭必然导致整个宇宙体系的崩塌。因此,在中国,不能简单以反对统治阶级暴政、实现个人和共同的自由为由宣布“造反有理”。它必须以体制名义得到确认,指称统治者违背了上天的意志,没有充分而正确地维系社会秩序。一个王朝“最后、最差的统治者”的不当行为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有效性。^① 他的举止悖逆使得整个体制陷入瘫痪,鼓励人们反对他。造反者常常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名揭竿而起,这是诉诸武力最具合法性的主题,也是最具根本意义的道德支持。

随之,文道兴盛、和平艺术尤其是统治者的圣明是自然而合乎体统的,而武力扩张、残暴的军队和铁血的征服则永远不会获得宽恕。即使身处乱局,这一观点也被称许为评判征服的历史准则。

中国官僚政治包含多少尚武精神?

另外一个因素,即中国官僚政府的早期成就对学者、道家驯化暴民的努力提供了支持。因为中国陷入内陆包围,其扩张是逐步的,且沿着陆地边界进行,更专注于从社会组织内部找寻敌人,而不是向外发展,是向内挤压而不是向外爆破。汉朝统治者继续维系与地方统治者和非中华统治者的宗藩关系,也通过州县的设立建立起领土管理架构。不久,统治者就进行选拔考试,根据其才能选任州县主官,任命他们在有限的一段时间主事,领取固定的俸禄,通过系列命令和奏疏控制其行为。官僚政治由此而生。^② 这一努力使得军事更容易处于中央管控之下,部分因为文官通过收税可以维系对军事的独立,部分则因为军事自身的官僚化,在人事和资源上受到中央命令的某种管控。军人发现文官指派他们任务,撰写健康检查报告,提供给养,指导他们的战略,在史书中对他们进行评价。在世界其他地方,充满活力的平民百姓通过当兵实现崛起的机会甚多,而在中国则受到限制,除非处于社

① 关于“最后、最差的统治者”的原型,参见:Arthur F. Wright, “Sui Yang-Ti”, in A. F. Wright, ed.,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62。

② H. G. Creel, “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Hsi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2 (February 1964), pp. 155 - 184.